

构建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综述

高 丹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改革新的起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同时又承担起更重要的新的历史使命。面对着百年未遇之变局，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构建起符合边疆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来指导边疆经济的发展。回顾过去边疆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对于边疆经济研究的文献不多，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也谈不上指导边疆经济发展。因此，研究边境经济发展、推动构建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指导边疆经济发展等就成了我们研究边疆经济发展专家、学者责无旁贷的责任。本文在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边疆经济发展，从国内、国际以及学科交叉的角度，探讨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为边疆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一、国内边疆经济学理论构建

我国最早开始关注“边疆经济学”的理论构建的省份是黑龙江，1984年，边疆经济研究室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成立，徐晓光(1986)提出了中国边疆经济学的构想。对边疆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了较全面阐述的是牛德林教授。80年代，牛德林提出“超常发展战略”这一概念，认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封则衰”，要突出“开”的特色。同时他提出“周观经济”与“要素跨国优化论”，为我国边疆地区自身经济发展及跨境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陆地边疆这一地域空间应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经济增长与发展运动规律的经济理论抽象。他认为“要素跨国优化”是国际分工、互补合作的结构，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往往是从贸易开始，通过产品、资源的交换，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在区域内开展资源开发合作、资源共享，以最终实现要素的跨国以及国际间的优化组合，保障所有参与过的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随着边疆经济领域理论的逐渐丰富，边疆经济学作为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边疆地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90年代是我国边疆经济学研究的高峰时期。1991年，我国开放了满洲里、绥芬河、丹东、珲春4个北部口岸，随后又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4个边疆省会城市，开放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乐、瑞丽、畹町、河口、凭祥、兴东等边疆城市。1992年我国批准建设14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开启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新的征程，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由沿海、

沿江扩大到沿边，走向全面的开放（李光辉等，2011）。随之，也开启了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之热潮。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后，针对边疆地区的特点学者们开始研究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合作、跨境经济合作区等。

1993 年-2000 年可以说是边境贸易政策的调整与改进期。90 年代初逐步恢复开展的边疆贸易是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特有的经济现象，是相邻国家根据各自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方式的特点和需要，开展的特殊的贸易活动，分为边境地方贸易、边境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边境旅游贸易、边境经济技术合作贸易等形式（高志刚等，1998）。边境贸易是振兴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受对边境贸易认识以及历史、时间、空间等因素局限性的制约，我国边境贸易在 90 年代仍然处在粗放型低级水平，缺乏竞争力（董国富，1998），未能完全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任烈（1998）认为，应将边境贸易的发展纳入沿边经济开放的大战略中，并运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观，指导边境贸易发展战略向公平、规范、自由的方向发展。彼时正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谈判期，加入 WTO 之后，边疆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需要遵循 WTO 原则，为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需要我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与国家经济规则接轨的边境贸易运行以及管理体系（杜发春，2000）。

在 90 年代，我国边疆经济建设面临很多特殊性的问题，包括思想解放不够、经济基础薄弱、领导者思路及管理方式陈旧等。我国边疆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这些特殊性，因地制宜制定出可操作性的方针（李明富，1998），深入挖掘在地理位置、生活习惯、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状态、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发展优势，促进经济建设（邱济洲等，2000）。利用边疆地区区位优势，边疆经济合作区的设立就是促进边疆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边境跨国经济合作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形式，其表现形式是边境贸易，目的是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李玉虹等，2000），能够刺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进一步促进边疆对外开放，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脱离贫困。

2000-2013 年这个阶段，在国家政策支持和我国加入 WTO 大背景下，边疆地区迎来发展机遇，也面临很多挑战。2000 年，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启动，边疆地区的发展走向了新的台阶。2001 年，我国正式加入 WTO，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 WTO 的框架下，学者们对边境贸易、边境经济合作等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边疆地区研究的系列成果。李光辉（2010）认为，边境贸易能够培育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形成，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市场型转化，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需要着重注意边境贸易和贸易政策的“空心化”问题，通过宏观管理和微观调整规范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需要在产品、品牌的边

贸特点上进行创新，提高边贸产品竞争力，同时扩大边境贸易的内涵，提高与边贸相关的配套政策的设计，才能使得边贸在国际贸易中占有更具竞争力的地位（李常林等，2003）。这时的边境贸易研究更具专题性和专业性，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03）从金融支持的角度研究边境贸易的发展，认为金融业在信贷、外汇管理、结算等方面尚未提供给边境贸易足够的支持，应加强与邻国的金融合作水平，进一步促进边贸发展。

为适应 WTO 成员国这一新的身份，也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边境经济合作区作为我国边疆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担负着经济通道和口岸经济，将开发“死角”变成“活角”的重要作用（田光伟，2004）。李光辉（2012）认为，边境经济合作区在理论上具备可发展性，在实践上具备可借鉴性，关键要制定适宜的管理模式。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功能体现在优化边疆地区产业结构、扩大境外影响以及有助边疆城市发展等方面，将有力推动“兴边富民”行动进程（战成秀，2013）。

2013 年进入新时期，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更多的重视，边疆地区也很有潜力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可以说进入新时期，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时机已经成熟。任何一种理论的创建，都需要建立逻辑自治的理论体系，深挖并理清研究相关概念、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内在逻辑（欧阳晓，2018）。刑玉林（1992）指出边疆在古代和近代的定义的区别，他认为“近代边疆是指国家陆路边

界线内侧的或在国家海岸线外侧的、且属于该国主权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而古代边疆则是指在本国与外国之间的习惯界线、自然界限内侧的，或在本国海岸线外侧的，且属本国主权的或为本国实际管辖的或为民族生息繁衍的边缘陆路领土或海洋领土。”刘啸霆（1999）认为“边疆是靠近各国边境线的相对完整的行政区域。”马大正（2002）认为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及政治的综合概念，并具有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学术界多认同这种综合性的概念框架，一般认为考虑边疆的经济价值时候仅只陆地边疆，陆地边疆指既有国界，又有直接在国土上相邻的国家，并位于国界内侧的一定经济社会区域。

关于边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牛德林认为，边疆经济学“是以边疆这一特殊区域的特殊经济社会运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和客体，研究边疆地区经济运动的特点、经济结构和规律的科学”。这三层含义，具体来说，第一层是边疆地区的经济运动的特点，第二层是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称为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包括边疆地区内部各个经济部门、经济形势、产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包括边疆与内地、沿海之间的经济互动；第三层是经济规律。

边疆经济学的根本任务，牛德林认为，是研究和介绍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和特殊规律。研究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生产方式的深层次上，研究边疆生产力内部、生产关系内部、上层建筑内部以及各个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研究边疆地区

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时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因素融汇在一起，组成一个优化的运动系统，取得边疆经济稳定、协调、迅速、持续的发展和增长。具体来看，包括边疆经济社会中的理论问题、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实际经济社会问题、边疆地区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以及边疆地区的国际比较四个方面。

学界对于边疆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边疆经济理论的发展定位应该是跳跃的，甚至超常规的。理由是边疆地区是真正的我国国家发展的“资源库”，必须通过超常规的方法进行资源开发，才能够有效遏制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虽然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是正常的，但是若各个区域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过大，则极易造成人民心里不平衡甚至有碍社会稳定。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边疆经济学理论应该是适度的、有计划的、有节制的。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增加了人民对资源更大的需求，然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保障资源完全合理及完备的开发和利用，因此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应该进行有节制的经济增长（黄万伦等，1990）。

边疆地区开发开放促进了边疆经济的发展，同时对边疆的社会、生态、安全、环境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边疆经济是“边疆”这一综合体系中的一环。“边疆经济学”到底是“边疆学”学科的扩展还是新学科的诞生，引起了学界不少的争论。我国边疆学是一

门综合性学科，其综合性的特点体现在对各个领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马大正，2003）。边疆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涉及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经过长时间发展，疆学的学科归属及其构建仍然处于困境（杨洪明，2018）。一方面，学界对边疆学的体系、内涵及特点等诸多问题还缺乏一致认识，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学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多次印发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无论是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迄今都没有“边疆学”的名分。梁双陆（2008）认为，中国边疆学可以分为“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两个部分。边疆学把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作为边疆学的一个子系统，研究边疆个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每个阶段对于边疆的开发与经营，边疆资源的配置和运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各个部门的经济，边疆经济的发展及其水平，生态环境与边疆人民的互动关系等（方铁，2007）。

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边疆经济学科理论，学科建设成果十分有限，杨明洪（2016）认为，我国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学术上对边疆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够，对“边疆经济学”和“经济边疆学”学科的混淆。另外一方面，边疆经济学一般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的范畴，但到目前为止，区域经济学并未纳入关于边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除此之外，我国在边疆经济学领域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研究较少，Alexander Bukh 等研究人员写了大量关于边疆经济发展以及边疆经济理论

等方面的文章，非常值得借鉴，但我国学术界对这些文章并未有相关研究。我国尚未形成能够指导边疆经济发展的完整的边疆经济学理论体系。边疆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与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边疆区域发展对我国内陆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正面作用，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因此亟需建立能够指导边疆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指导。

二、国外边疆经济学理论构建

（一）特纳与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

1892 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Frederic Jackson Turner) (1861-1932) 发表《美国史若干问题》，他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认识历史需要以现实为基础，首次提出“边疆”这一术语，强调了美国西部殖民进程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1893 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学年会上，宣读《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该文章意义重大，打破了美国历史囿于欧洲根源的束缚，从美国本土寻找其社会及文化的根源，“边疆”地带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被重点突显出来。特纳边疆学说的提出契合了时代的需要，他提出的从美国本土找寻根源的思想正满足了当时美国人寻求民族自豪感、文化独立感的心里需求。

“边疆思想”很快成为 20 世纪初美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由此诞生影响巨大且深远的“边疆学派”。作为“边疆学派”的领军人物，特纳提出要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指出“不能根据边疆、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对人类行为做单一解释，所有上述因素混杂的缠绕在一起，形成激发力量。需要对每一条线进行艰苦追寻，需要准确的它与其他所有线的关系。”特纳尤其注重地理学与历史学与边疆研究的密切关系，主张运用地质学、地图学方面的相关知识，创立对历史的新解释，从而实现历史与地理的融合。

特纳的研究基本集中于美国西部边疆的历史，及其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关系。特纳认为，边疆最重要的就是它是不断移动的，是“记录人民发展能力的一条图线”，“是向西移民浪潮的前沿-野蛮和文明的汇合处。”“边疆人”（Frontier Men）以及“边疆风格”（Frontier Style）所见证和体现的美国的西部边疆及其西进运动（Westwood Movement）塑造了美国的特性（邢军东，2000）。“边疆促进了美国特殊的民族性的形成；边疆使美国民族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束缚，使美国社会有着强烈的‘拓荒者’精神，因而边疆是美国式民主的产生地；边疆为美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安全阀’。”¹特纳突破了边疆仅作为“边防线”的功能，将“边疆”作为经济学概念引入出来，并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将边疆划分为“商业边疆”、“矿业边疆”或“农业边疆”等。“边疆学派”使得边疆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课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科学概括成为可能性。

继特纳之后,另一位边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在特纳提出主要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边疆的时候,拉铁摩尔将人类学、经济学等更多学科应用其中,且拉铁摩尔不仅局限于美国边疆的研究,而是将眼光放在世界,研究范围包括罗马帝国、澳大利亚、英国、印度、中国以及非洲、拉美等多个国家的边疆区域。拉铁摩尔厘清了边疆(Frontiers)与边界(Boundary)的概念,强调边疆的地带性意义。拉铁摩尔看来,边疆是“不稳定的”和“复杂的”。他认为,边疆不是一条界线,而是一片区域,一个过渡地带或缓冲地带,边疆已经由单纯的“物理边界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

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被称为是颇具中国情结的边疆研究学者(李宏伟等,2012)。他对我国边疆区域进行了划分,分析了陆权与海权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重点研究了我国边疆地区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并提出“蓄水池”地带概念,阐述了完全不兼容的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如何形成经济模式的对立统一。他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并非是割裂开来独自发展的两个路径,而应是相互接触、相互影响,最终在两者衔接的边疆地带相互影响转化的一个统一体。拉铁摩尔认为贸易在中属中亚地区意义重大,“丝绸之路”如此的贸易路线能够将中亚与世界联系起来。拉铁摩尔对我国新疆地区研究最为深入和广泛,认为我国新疆地区将成为亚洲的枢纽,成为未来世界的中心。

（二） 边疆“动态性”研究

边疆地区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等复杂，具有社会构架，是互动系统中的一部分，能否进行指导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学科建设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David Newman, 2003)。现实中的“边疆”是有着多层次含义的概念，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包括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地理学家、建筑师等学者参与到了边疆区域的研究中，研究角度经常涉及政治地理学、历史学、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等多种学科(Anna Krasteva)。

国外学者对边疆的研究基本沿袭了特纳和拉铁摩尔的思想，多集中在边疆“动态性”方面。在跨学科背景下研究动态边疆理论的组成因素，Victor Konrad 认为目前边疆动态研究需要纳入三个组成因素。第一是边疆形成与实现(border generation and realization)，发现边疆形成的动力及运动，找到边疆地区的中介的特点；第二是边疆动态特征(border dynamic signature)，解释运动相关因素之间的联系，在理论背景下，跟踪边疆运动的轨迹将揭示超越其他类似学科的秩序；第三是边疆的改变与重建(alter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the border)，在探索边疆动态性的过程中一些需要变更的因素。

Todd Hataley & Christian Leuprecht (2018) 也指出国际边疆是动态变化的。资源配置、社会机制等都对边疆的创造、消失、移动、再移动发挥影响。边疆地区是一个网络化、流动着的过程，

而并非固定的一条线。边疆地区通常是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地，权力和文化相撞（Gerard Delanty, 2006），地区冲突、双边贸易、区域一体化都影响边疆的变化。例如，欧盟成立之后，欧洲的边疆赋予了新的意义，之前国家之间的政治边界已经不再存在，边界留下的功能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国外对于边疆经济的专门研究较少，通常更加注重边疆的地理、历史以及政治层面的含义。

由上述研究可见，国外对于“边疆”的研究多集中在边疆地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含义，罕有边疆经济的研究，尚未形成边疆经济的理论体系。

三、相关学科在构建边疆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区域经济学指导边疆经济发展

鉴于“边疆”特殊的区位特点，区域经济学是边疆经济学理论最直接相关的学科，边疆经济学是我国“边疆地区”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有较为完备和成熟的体系，其学科发展一直以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主线及目标，并结合我国实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方法，正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区域经济研究重点关注基础理论和实践热点两个层面（吴传清等，2017）。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符合我国现实国情，是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调整的问题，总结为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充分、区域政策体系不完善、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

型及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受到制约等五大方向，而国外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主要关注非都市发展、产业再布局、人口迁移等问题（夏添等，2019）。

区域经济学中对边疆经济发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阶段差异问题、地区差异问题、区域产业结构构建以及区域城市发展等方面。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会经历非均衡发展的阶段，但是若这种非均衡非协调的结构长期发展，并固化成疾，将给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边疆地区与沿海及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如何构建边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利益协调机制，将非协调变为全方位均衡是我国经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我国区域间的平衡发展意义重大。一般认为，区域一体化为边疆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前，我国国内运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对边疆经济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建设等实际经济问题，普遍是针对政策对策的研究和理论总结（黄万伦、李文潮、牛德林、杨德颖等）。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后，则增强了边疆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研究领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边疆地区产业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较为薄弱。区域经济最直接也是最容易产生效果的产业聚集效应，得益于低廉的运输成本、较高的效率及运输率，我国边疆地区的铁路交通发展有利于第二产业的集聚。因此需要

配合国内外市场，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边疆产业集聚，寻求与开放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促进边疆省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杨先明等，2018）。注重东北、西北、西南三个特殊的经济区位优势产业特点，从战略顶层设计到基层执行进行分类指导，构建合理的完善的成体系的边疆经济产业结构（梁双陆，2008）。在扎实推进传统支柱产业的产业提升优化的基础上，探索行业整合上的新突破（尹欣，2004），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新兴产业发展，充分借鉴边疆地区的特点和优势，立足资源优势，包括气候优势，如云南热带特点，培育热带天然香料、南药等新兴生物产业。

我国目前的城镇格局的两极化倾向较为严重，“大城市病”、“半城镇化病”、“中小城镇病”特征明显，边疆地区急需提升中小城镇的向心力、聚集力，解决“空心化”问题（陈心颖等，2018）。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是我国边疆地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有效途径（杨丽云，2001）。

1936 年，哈伯特·路易所提出的“边缘城市”的概念，是“边缘城市理论”的原型。1942 年，Wehrwein（1942）将混合土地利用模式下居住人口增长较快的区域界定城市边缘区，Andrews（1942）提出了“乡村-城市边缘带”的概念，并认为“乡村-城市边缘带”包含城市边缘带。随着对城市边缘带研究的深入，国外不少学者发现此前对城市边缘带的定义较为片面，Pryor（1968）相对全面地定义城市边缘区为城乡间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的过渡

区，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地域特征。城市边缘区呈现土地利用多样化、人口结构复杂、产业受城市发展影响较大，且经济发展受城乡双向影响（毛艺琚等，2019）。我国国内关于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定义为“城乡结合部”。顾朝林等（1993）人首次从理论上认为城市边缘区内边界应以城市建成区基本行政单位——街道为界，外边界以城市扩散范围为限。作为城市建成区与乡村之间受城市辐射影响的过渡地带（张建明等，1997），该范围大于传统的城乡结合部，并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变化（方修琦等，2002）。

边疆地区从区位上看，位于边缘地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特殊地段。边缘城市在边疆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一般性作用以外，还包括一是沟通国内外经济联合、技术协作和商品流通方面的流转功能；二是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商品集散地的外贸功能；三是国际贸易中资源导向和对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引导的双重导向功能；四是生产加工功能（梁双陆，2008）。我国边疆地区所处的地缘经济中心-外围格局的边缘地带，这一特殊区域决定边疆地区要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开发优先”战略，与重塑周边及国际生产网络为目标的国际产能合作战略有机融合，才能够实现由外围向边缘增长中心转化最重要的初始条件。在此基础上，积极兴办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带动城市现代化、构筑外向型的城市体系、建立口岸城市经

济区、促进边疆地区城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边疆城市发展步伐（杨德颖，1992）。

（二）民族经济学指导边疆经济发展

民族经济学学科将“民族”与“经济”两个因素相结合，作为经济学中地道的中国学派，1979年，我国学者提出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构建（黄万伦，施正一，197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的工作重点。作为多民族国家，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以及科技现代化，是所有民族的目标和任务。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完成我国“四化”任务的重要环节，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构建就此产生，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是学科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经济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既有联系又有冲突，尤其在全球经济的融合度更高的新时代。

经过40多年的发展，学科建设经历了初步形成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学科深化建设期（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进入学科研究热潮期（90年代末至今）（张丽君，2016），研究成果颇多，也较为深入，但目前民族经济学尚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基础理论，仍处于“前科学阶段”（李曦辉，2019）。学者们对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内涵有不同的认识，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即为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学（李忠斌，2003），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结合的产物（陈庆

德，1994），也有学者将民族经济学与民族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都有内容交叉，其应用性研究难以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框架，致使部分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有显著的“信任危机”，认为民族经济学就很难成为独立存在的合理的学科（邓艾、李辉，2005）。除对学科的归属性有争议之外，学科组织也不够稳定，“稳定的组织运行是学科组织成熟的一个标志。”（宣勇等，2010），国内各高校对民族经济学所在院系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组织结构，该学科的人才培养缺乏连贯性。

进入 21 世纪，我国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广度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但发展至今，学界依然尚未对民族经济学的定义达成统一意见，而“民族经济”在特定的语境下也有不同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特指少数民族经济（高艳泓，1990），包括“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及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民族经济学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区域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问题（邓艾等，2005），从而试图总结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东人达等，2013）。还有学者对民族经济学进行了扩展，将民族经济学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狭义层面，民族经济学研究以民族属性定义的经济生活的特殊规律为主线，着重分析民族文化影响之下行为、习惯的变化以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规律；广义层面，需要进一步拓展民族经济的概念，引入民族国家的内涵（王文长，1999）。

民族经济学学科的构建还在过程中，学术界对其体系构建方法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内在区别与联系做了广泛的讨论。民族经济学中，“民族”与“经济”哪个因素更重要也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一派学者认为民族是包括信仰、习俗、语言文字、性格特征、行为模式等多种因素由族群认同的文化共同体，而并不能简单的定义为经济实体，经济的民族性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并建议民族经济学向系统科学转变（牟钟鉴，2003；刘永佶，2007）。而另一派学者则指出外部环境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以更好地贴近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黄建英，2005）。我国在推进民族经济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特性，找到二者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促进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叶坦，2005）。

Froncois Perroux (1987)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人们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边疆地区的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一些经济发展明显落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国防或生态位置重要的贫困地区，国家给予重点支持，进行集中连片开发。继续开展‘兴边富民’行动。”目的就是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西部大开发是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典型案例（叶坦，2004）。

边疆西部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商品将更具市场竞争力，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兴边富民”行动规划，也要求“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继续在金融、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民族自治地方的边境县和兵团边境团场比照享受民族贸易县的优惠政策。”因此探索构建边疆经济学理论，离不开对民族经济学的深入研究。边疆地区的开发开放，能够助力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的开放型经济水平，而民族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的开发和经济合作，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边疆地区的开放合作。

（三） 发展经济学指导边疆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Myrdal，1957）提出“循环累计因果理论”，即经济增长阶段会经历“回流效应”以及“扩散效应”，在这两个效应的作用下，一个区域发展在初始时期区域之间的差异会逐渐加大，尤其在欠发达国家或处于起步阶段的区域经济，回流效应一般强于扩散效应，富裕区域会更加富裕，贫困地区则更加贫困，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随后要素由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流动，也就是“中心-外围”的轨迹扩散，在外围地区产生循环累积增长，最终经济会产生趋同。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可以说为边疆经济发展及赶上我国内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发展经济学就是用来解决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的经济发展问题。自创立以来，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从热，到冷，再到热的过程（张建华等，

2016)。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发展经济学经历了繁荣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多用古典学派的分析框架，注重理论研究。到了 70 年代以后，因世界各经济体发展的世纪情况，发展经济学形成新古典主义分析框架，开始注重更加实际的经济政策问题。80 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发展”也被赋予了全球化、新技术革命、新制度革命等多层含义。

发展经济学解决的不平衡一方面是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分析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探索出在市场份额已经被发达国家占据的前提下，落后国家应该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樊纲，2019）。新中国 70 年来，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逐步走向经济强国的行列。我国 70 年经济发展是典型的转型式发展，从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型向现代工业经济、从封闭经济转型向开放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向市场经济体制。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新常态”，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国际环境也发生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也较为明显，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经济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收入不平等、地区发展不协调等挑战，因此我国经济急需速度更快、程度更深的转型式发展、高质量发展。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但还不能成为国际强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依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转型、最终实现完全的现代化的艰巨挑战。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根基,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质量、效率、公平程度、可持续性水平都更上一个台阶的经济发展(金碚,2018),这些都离不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展型式”也是不同的,通常“发展型式”用来概括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领域的系统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解决新的社会矛盾,根本是要靠发展。要采取系统的、战略的、革命的思维,深刻学习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许广月,2019)。

这就引出了发展经济学另一个核心内容,即解决国内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我国边疆地区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地区,相比于我国其他地区,边疆地区所处的经济阶段较为“初级”,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阿瑟·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体现在“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工业化”与“农业化”并存,“城市”与“农村”并存。边疆地区经济就是“二元”的重要部分。边疆地区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逐渐缩小与沿海及内陆地区发展差距,创造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完全照搬内陆及沿

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形成高速度高质量的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针对边疆地区发展振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经济均衡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规划，西部地区市场模式、产业模式、投资模式、制度模式以及协调模式需要形成引领-推进-带动-匹配-矫正的模式结构（李瑞娥等，2013），西部等边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再市场规律与制度逻辑的平衡契约间不断探索。

我国 70 年形成的多层次、多阶段、多梯度的转型式经济增长方式在促进了我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学（任保平，2019）。发展经济学中现代化工业化的战略支撑也解释了中国建国之后创造的经济飞跃奇迹，我国未来经济的高质量转型，边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可以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找到相对应支撑。

四、新时期我国边疆经济发展的实践研究

大力发展边疆经济是我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李光辉等，2020）。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其中特别指出“要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

展的开放高地”，首次将“沿边开放”与“沿海、内陆开放”并列提出作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组成部分。“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推动内陆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洼地变成开放的高地，形成东西双向户籍的开放格局，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边疆地区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门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起到连接、交汇的战略支撑作用。共建“一带一路”的五大方向中，有四个方向经由我国西北、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出发，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直接覆盖我国边疆地区。

边疆地区的发展一直受限于外围局势及自身条件。与我国接壤的邻国中，多数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家安全不够稳定，除俄罗斯外都是发展中国家。从经济方面上看，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经济规模小、市场体量小、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接壤地区也多是邻国的边远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在各国家平均水平之下。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边疆地区的对外合作与东部沿海截然不同。沿海地区的开放主要合作的对象是资本丰富、市场体制完善、技术先进的发达经济体，沿海地区开放侧重改革、创新和接轨国际。而边疆地区的邻国边境地区对经济合作发展的意识和意愿均不够强烈。更有甚者，对我国主动提出的合作持担忧和疑虑，他们羡慕又惧怕我国快速的经济的发展，虽然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仍未能完全抛弃思想观念的狭隘。

进入新时期，2013 年，《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出台；2015 年，《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规划(2014-2020)》和《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出台。同时，2013 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 年，党中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9 年，广西、云南以及黑龙江三个边疆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在国家顶层设计政策支持下，第一次系统地对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战略布局，第一次把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纳入到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来，第一次对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进行系统的完善和构建（李光辉等，2020）。经过近 40 年的开放发展，我国边疆地区形成了特色开放模式。从静态角度来看，边疆地区逐渐形成了边境贸易、贸易通道、产业集聚、口岸城市、跨境合作区五种开放模式（胡超等，2017），从动态角度讲，边疆地区分别处于口岸建设、岸城互动、腹地支撑三个发展阶段（胡超等，2015）。新时期，学术界针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研究多集中在边境贸易、边疆产业、跨境经济合作以及边疆城市群发展等问题。

（一）边境贸易研究

边境贸易是边疆地区对外贸易中特有的贸易方式，也有学者认为是国际贸易的补充，国内边疆地区的对外贸易研究集中在边境贸易领域。边境贸易随着边疆地区开发开放并行发展。改革开

放初期,边境贸易主要以边民互市贸易为主。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开始追求更高水准的生活水平,这种需求“诱致性”的直接带来边民互市的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开启了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大门(胡超等,2015)。边民互市贸易不断壮大为边境小额贸易的开展进行了试验。从政府到企业,边境小额贸易需求强烈,边境小额贸易由有关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企业作为参与主体,在双方商定的口岸和贸易点进行交易。

随着我国越来越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国际地区的经贸往来逐渐增多,边境贸易的概念和范围已经不单单是商品的交换活动。最初形态的边境贸易被认为是对外贸易的补充,贸易对象是与我国边疆地区毗邻的国家地区。在这样的特殊区域开展贸易,目的是为了活跃边境地区市场,解决边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其定义和内涵发生改变,现阶段的边境贸易一般指我国在边境地区进行的,全部与经贸有关的活动和对外经济贸易联系(杨清震,2005)。由古至今,边境贸易都兼备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一方面能够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边疆人民的收入增长和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等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巩固民族团结,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和睦邻里广西等政治效用(李慧娟,2016)。从全世界范围的边境贸易发展来看,边境贸易一方面加强了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同时促进文化理解和社会沟通,在经贸活动的互动中培养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为促进和支持边境贸易发展，我国政府不断丰富、调整、完善相应的边境贸易政策、规范管理方式，更加注重边境贸易的创新发展。**2019**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增长**6.1%**，高于整体增速**2.7%**。从政策扶持的角度，边境贸易的发展经历了政策启动和探索阶段（**1979**年-**1985**年）、政策鼓励和扶持（**1986**年-**1992**年）、政策调整与改进（**1993**年-**2000**年）、政策发展和完善（**2001**年-**2013**年）、政策形成和执行（**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的政策制定是随着我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即国内经济政策调整而循序渐进的发展的。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的边境贸易扶持政策体系，不断推动边境贸易向更高层次迈进。

2001年以前，边境贸易经历从探索性发展到扩张性发展的阶段性转变，边境贸易政策也随之调整与改进。**90**年代初，相邻国家根据各自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方式的特点和需要，边境贸易的开展方式更加多元化，出现了边境旅游贸易、边境文化交流及其他各类综合性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形式（高志刚等，**1998**）。边境贸易规模迅速提高，一些问题也凸显出来。当时的边境贸易大部分依靠个人信誉进行风险担保，贸易关系并不牢靠，很多投机者借此扰乱了边境贸易市场，边境贸易中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对我国边境贸易秩序危害极大。因而，在**1996**年，国家出台新的边境贸易政策，从边境贸易概念的确定、宽泛优惠政策的调整，以及对边境贸易与易货贸易的区分等方面

做了严格的规定，以规范和管理边境贸易。整体上看，受对边境贸易认识以及历史、时间、空间等因素局限性的制约，我国边境贸易在 90 年代仍然处在粗放型低级水平，我国边境贸易与相关国家间的贸易不平衡，贸易政策不对等，因而无法进行商业及贸易信息的有效流动（傅自应，2001），其经济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资源效益尚未显现，缺乏竞争力，未能完全发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当时的沿海地区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逐渐世界名牌的生产基地，而边疆地区未能把握地缘优势，也错失了边境贸易开发面向国际市场的大好机遇（秦放鸣，1998）。彼时正值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谈判期，加入 WTO 之后，边疆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需要遵循 WTO 原则，我国亟须尽快建立适应国际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尽快出台能国家经济规则接轨的边境贸易运行以及管理体系，为促进边境贸易的发展。

加入 WTO，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赋予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好的机遇。从此，我国边境贸易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中，需要应对更复杂的外汇风险和市场风险。因而一方面要充分灵活运用 WTO “例外” 条款保障我国特殊边境政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边境贸易政策与 WTO 中 GATT 关于边境贸易的相关政策的比对与借鉴，并根据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宾建成，2004）。但加入 WTO 后初期的边境贸易政策问题明显。边境贸易政策在制定、调整以及

实施中的主要问题,发现边境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的支持,边境贸易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贯性,且因为边境贸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政策不统一、管理松散等造成难落地。边境贸易参与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中,需要更有创新度的产品和品牌建设,提高边境贸易整体竞争力,同时扩大边境贸易的内涵,提高与边境贸易相关的配套政策的设计,才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更具竞争力的地位。为达到上述目的,那时的边境贸易研究专业性更强,地域性更明显。

新时期,我国政府不断丰富、调整、完善相应的边贸政策,不断规范管理方式,更加注重边境贸易的创新发展,我国的边境贸易持续稳健发展,2019年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增长**6.1%**,高于整体增速**2.7**个百分点。我国的边境贸易在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小娟,2013),为促进边境贸易发展,应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使用、机制创新等领域的水平,同时积极加入多种区域组织,组建自己的自贸区,令边疆省份及其周边国家享受共同利益,提高我国的竞争力。边境贸易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外经济贸易形式,兼备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边境贸易是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形式,一方面能够促进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边疆人民的收入增长和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等经济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加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巩固民族团结,促进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和睦邻里广西等政治效用(李慧娟,2016)。世界银行认为,边境贸易的功能主要体现在

加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文化理解和社会沟通，以及培养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边境贸易对于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和边民生活水平提高都有很大贡献，但因为种种原因，边境贸易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整体来看，边境贸易功能受限的原因一是制度供给不足，二是贸易模式单一，三是口岸以及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四是各地区之间的贸易竞争加剧（刘建利，2011；吴汉洪，2013）。进入新时期，全面开放性格局的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打通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环节都至关重要，全球经济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同时创造了很多经济新模式，那么边境贸易的定义及发展策略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未来，边境贸易将在世界贸易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全球经济在信息技术不断更新的同时创造了很多经济新模式，那么边境贸易的定义及发展策略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为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政府一方面要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守住“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注重“非交易成本”的影响。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使用、机制创新等领域的水平，同时积极加入多种区域组织，组建自己的自贸区，令边疆省份及其周边国家享受共同利益，提高我国的竞争力（杨小娟，2013）。

（二） 边疆产业体系研究

边疆地区贸易活动的增加、经济的繁荣发展都离不开边疆特色产业的支持。国内外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什么是产业政策”以及“如何推进产业政策”的问题展开讨论。产业政策的选择争论较为人熟知的是林毅夫从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与张维迎米塞斯-哈耶克视角的争论，也包括从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案例比较、发展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等多个视角的讨论（顾昕，2017；James Robinson，2016；Joseph Stiglitz，2002；Joseph Stiglitz，2002；常耀中，2017）。

作为不同国度之间的连接地带,边疆地区直接反映了国际间、区域间的差异化需求（Schmitz，2010）。边疆地区的产业政策是改变边疆区域落后、贫穷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种有效途径（Humphrey，2011）。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产业合作往往会创造出产业集群，反过来产业集群也促进了产业合作，形成边疆产业集群的创新机制，进入集群发展的深层次阶段，不断为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积累力量。以企业聚集机制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收益剩余的市场扩展机制和价格机制角度分析，我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潜在动力十分强大（李铁立，2005）。但目前我国边疆地区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以低成本的产业集群为主，尚未对经济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边疆地区需要从自身的创新与外在的吸

纳两个途径提高产业集聚对实体经济服务水平（秦远建等，2015）。

从优势产业构建来看，跨境旅游被认为是边疆地区发展潜力巨大的优势产业。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在项目、资金和政策上对边境地区旅游业予以倾斜支持，大力发展‘多彩边境’旅游和跨境特色旅游”。边疆地区位置特殊，跨境旅游作为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新形式，指的是毗邻的两国在各自边境地区划定一块区域开展跨境旅游合作，通过在该区域实施特殊的旅游政策，发展区域内旅游产业的特殊区域。通常情况下，发展跨境旅游要依靠跨境旅游合作区平台，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是相邻两国或多国在边境双方或多方划定一定的国土面积，由双边或多边共同规划管理的以旅游产业为主导，通过促进旅游者、旅游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而形成的旅游要素规模聚集的区域。跨境旅游合作区的建立不仅可以增进双边或多边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此的了解，助推民心相通，巩固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而且以旅游产业为依托，可以充分发挥沿边地区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实现边境地区由过境通道向新型旅游目的地转型，进而有效带动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助推兴边富民的重要抓手（田里等，2018）。跨境旅游只是边疆地区跨境合作的其中一种形式。边疆跨境合作还包括能源合作、现代化农业合作等多种形式。

（三）边疆跨境合作研究

根据边疆特殊区位特点，边疆产业政策研究通常与跨境合作联系在一起，分析跨境产业合作的发展前景。一般而言，跨境合作能够实现的一个前提是边境两侧存在资源上的互补性（Houtum, 2000），其中一类体现方式就是边境两侧存在经济上的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使得经济上的优势国家向劣势国家出口技术和工业制成品，劣势国家则反过来向优势国家输入农产品、原材料和劳动力。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合作已经形成一定基础，沿边重点开发区经济合作成效显著，2018 年末沿边 9 省区、自治区的 GDP 总计 134197.22 亿元，占据全国约 14% 左右，而 2000 年仅为 17936.56 亿元（向晓敏等，2019）。近年来，我国出口到周边国家的高附加值产品比例越来越高，能源、资源均为我国主要进口商品，基本上实现了与周边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优势互补、资源互通（刘保奎，2013），形成能源资源合作、农林牧业以及面向外方市场的家用电器、轻工纺织等三大领域的跨境产业合作（丁阳等，2015）。

但是我国边疆地区的跨境合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从跨境合作的基础要素互通方面来看，我国边疆地区急缺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严重制约了边疆地区的产业创新力。边疆地区市场规模较小，供需水平均较低，且电力、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极大制约了边疆地区扩大产业合作的可能性（向晓敏

等，2019）。因此，要顺利推进边疆地区与邻国的跨境合作，需要认识到边民主体性在边疆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其不仅具有区域内涵，同时也具有社会网络与族群身份的内涵，呈现出边境地区长期以来的多元面向，并且也能够服务于边境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区域互通（赵萱等，2018）。与此同时，在边境口岸的进一步发展建设中，应当超越“市场化”的单一维度，发挥边境口岸其在地缘政治战略与地缘经济战略中的潜在作用，提升口岸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实现交流价值的可能性（徐黎丽等，2017）。

（四） 边疆城市发展研究

边疆城市的基础设施升级能够促进边疆经济繁荣，而反过来边疆经济的发展也是边疆进一步建设现代化城市网络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边疆地区不再单一地发挥军事、防御功能，还将更充分的发挥经济、文化、社会功能，并且多以边境贸易、次区域合作、双边合作甚至更高级的跨境经济圈构建等，城镇建设将成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从 90 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杜作锋，2001）。城市作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结合点，是区域开发的关键，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边境城市是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心，其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边疆地区的发达程度(于天福等,2015)。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边境城市扩张，而城市的扩张也会创

造更多的敬业机会，吸引劳动力、资金不断向边疆地区集聚。国外学者认为边境城市化发展主要遵循两种模式，一是传统的边境开发模式。从开始移民，到边境地区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再到巩固边境地区民众数量（Bylund, 1960; Olsson, 1969; Hudson 1969）。二是核心-边缘模式。通过四个阶段，即交通发展期（Taaffe, Morrill, and Gould, 1963）、买办期(Vance, 1970)、到 Monte Carlo 期(Morrill, 1963)，核心-边缘期(Brown, 1991)。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加入第三种模式，即不同地区增长的模式。主要通过对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进行经济专门化、集聚化的发展（杜作锋，2001）。

边疆地区作为边缘城市集合，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本身连接着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即是生产基地，也是出口商品集散地。边缘城市能够通过快速的到市场信息，对国内贸易进行资源向导，促进国内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城市是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想促进边疆地区城市发展，在区域一体化中更加收益，则需要设立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由产业升级带动城市现代化发展，由贸易活动推进开放型的城市体系。建立口岸城市经济区、促进边疆地区城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边疆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措施（杨德颖，1992）。边疆地区已经有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边境口岸建设、金融及旅游试验区等平台建设，但是作用有限。因此，边疆地区城市发展潜力有限。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注重提高城市信息化的同

时，加快边境城市化的步伐，成为支撑边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牢固基地。

参考文献

1. Todd Hataley, Christian Leuprecht. Determinant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18, 33(3).
2. Gerard Delanty. The cosmopolitan imagination: critical cosmopolitanism and social theory[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6, 57(1).
3. Sonobe T, Otsuka K.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East Asia[M]/ Cluster - Bas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6.
4. World Bank, Cross -border Trade withi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2007, pp.4~36.
5. Joseph Stiglitz,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ization,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New International Trend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Brazili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nk (BNDES) , Rio Janeiro, September 12-13, 2002.
6. Schmirz, H. Local Up grading in Global Chains: Recent Findings[Z].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Denmark, 2010.
7.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y. 2011, 36(9).
8. Bylund, 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 in inner north Sweden. Geografiska Annaler B 42: 225-231, 1960.
9. Olsson. G. Complementary models: a study of colonization maps. Geografiska Annaler B 50: 1-18, 1969.
10. Hudson. J. C A location theory for rural settlement.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9: 365-381, 1969.
11. Tanffe. E. J, R. L. Marrill, and P. R. Gould, Transport expans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53: 503-529.
12. Vance, J. e. Jr, the merchant's world: the geography of wholesaling.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13. Morrill, R. L,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towns in Sweden: an historical predictive approach. *Annal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53: 1-14
 14. Brown. C. A. Place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an alternative view,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15. Putnam.: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Democracy*,2010,(6).
 16. Houtum, H.J.Van.An Overview of Europe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00, (1).
 17. Jorge Eduardo Mendoza,Bruno Dupeyron. Economic Integration, Emerging Fields an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Case of San Diego-Tijuana[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20,35(1).
 18. 王铁, 关于打造中国沿边经济圈的战略设想, 《管理世界》, 2008 年第 6 期。
 19. 赖聪聪, 90 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 《法制与社会》, 2017 年第 17 期。
 20. 王娟娟、任可,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区域经济政策的三次演进及启示, 《区域经济评论》, 2019 年第 5 期。
 21. 梁双陆, 《边疆经济学: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 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22. 牛德林,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边疆经济的超常发展》,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23. 徐晓光, 边疆经济学初探, 《学术交流》, 1986 年第 6 期。
 24. 牛德林, 边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意义, 《函授教育》, 1994 年第 4 期。
 25. 李明富, 把握好共性与个性 促进边疆经济建设, 《毛泽东思想研究》, 1998 年第 2 期。
 26. 邱济洲、秦梦宇、周建国, 边疆地区沿边开放战略及对策, 《世界经济文汇》, 2000 年第 1 期。
 27. 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基点思考, 杨丽云, 《经济问题探索》, 2001 年第 7 期。
 28. 尹欣, 实现“五个突破”发展边疆经济, 《宏观经济研究》, 2004 年第 1 期。

-
29. 吴传清、董旭，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区域经济学创新发展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30. 秦尊文、冷成英，网络经济动摇了区域经济学基石吗？《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6期。
31. 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重点的回顾与展望，韩玉刚、曹贤忠，《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9期。
32. 夏添、孙久文、宋准，新时代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评述，《经济学家》，2019年第9期。
33. 黄万伦、李文潮，《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34. 黄万伦、李文潮，《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35. 吴楚克，结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36. 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6期。
37. 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经济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38. 汪洪亮，抗战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及其“学科性”，《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39. 吴楚克，建设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应有的理论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40. 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1. 张丽君、杨秀明，基于学科发展史视角的“民族经济学”学科评述与展望，《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42. 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3. 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44. 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
45. 宣勇、杨奕, 大学学科组织成熟及其表征-基于国家重点学科的调查,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46. 高艳泓, 《民族发展经济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5 页。
 47. 东人达、腾新才, 论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归属,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1 期。
 48. 王文长, 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民族研究》, 1999 年第 4 期。
 49. 王建红, 论民族经济学体系构建方法, 《世界民族》, 2010 年第 3 期。
 50. 牟钟鉴, 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3 年第 4 期。
 51. 刘永佶, 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5 期。
 52. 黄建英, 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6 期。
 53. 李曦辉, 全球化中国版本与新民族经济学-兼论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财经理论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54. 叶坦, 民族性与新发展理念-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 《民族研究》, 2005 年第 4 期。
 55. 弗朗索瓦·佩鲁, 《新发展理念》(张宁等, 译), 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9 页。
 56. 叶坦,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学术界》, 2004 年第 2 期。
 57. 高丽娜、蒋伏心, 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分异与融合, 《南京市大学报》, 2010 年第 6 期。
 58. “何文彬,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金融互联的推进策略-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亚太经济》, 2018 年第 1 期。
 59. 陈心颖、陆杰华,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城镇结构失衡及其均衡化路径选择, 《东南学术》, 2018 年第 4 期。
 60. 张建华、杨少瑞, 发展经济学起源、脉络与现实因应, 《中国经济学新论》, 2016 年第 12 期。

-
61. 樊纲,“发展悖论”与“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案例,《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6期。
62. 许广月,论张培刚发展经济学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新时代使命,《经济学家》,2019年第4期。
63. 任保平,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创新,《学术月刊》,2019年08期。
64. 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65. 李瑞娥、程瑜,发展经济学视角的西部开发:理论、现实与模式构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66. 胡超、张莹,我国边境地区的开放模式、形成机理与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67. 胡超、张莹,中国沿边开放滞后的原因与模式演进研究综述,《区域经济评论》,2015年第5期。
68. 李慧娟,民族地区开放性经济构建中的边境贸易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7期。
69. 胡超、张莹,我国边境地区的开放模式、形成机理与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38(5):126-131
70. 商务部数据,
<http://wms.mofcom.gov.cn/article/xxfb/202001/20200102931426.shtml>
71. 杨小娟,我国边境贸易的影响因素和区域格局,《改革》,2013年第6期。
72. 李天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境贸易政策演变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
73. 刘建利,我国沿边口岸经济发展对策,《宏观经济管理》,2011年第9期。
74. 吴汉洪,边境贸易对广西产业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75. 代敏、李豫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新疆边境贸易发展潜力与前景分析-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
76. 顾昕, 产业政策治理模式创新的政治经济学,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7 年第 1 期。
77. 詹姆斯·罗宾逊, 《产业政策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视角》, 《比较》, 2016 年第 1 期。
78. 常耀中, 评论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产业政策辩论-以交易成本理论视角, 《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7 年第 1 期。
79. 刘保奎, 加快国际次区域产业合作的思路与对策, 《宏观经济管理》, 2013 年第 6 期。
80. 李铁立, 《边界效应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
81. 向晓敏、张瑞志、李人可, 沿边地区跨境产业合作: 问题、路径及对策, 《开放导报》, 2019 年第 5 期。
82. 秦远建、李大虎, 西部沿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机制、战略和对策, 《科学管理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83. 方维慰, 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国家的边界功能,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1999 年第 2 期。
84. 徐黎丽、杨亚雄, 论西北边境口岸的特点及发展路径,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3 期。
85. 王明昊, 吴丹,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想研究, 《经济纵横》, 2016 年第 8 期。
86. 赵萱、刘玺鸿, 无交流的交通: 日常跨界流动的人类学反思—以霍尔果斯口岸“中哈跨境合作中心”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6 期。
87. 向晓敏、张瑞志、李人可, 沿边地区跨境产业合作: 问题、路径及对策, 《开放导报》, 2019 年第 5 期。
88. 丁阳、夏友富、吕臣, 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的沿边开发开放问题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 期。
89. 刘建利, 我国沿边口岸经济发展对策, 《宏观经济管理》, 2011 年第 9 期。
90. 孙宏年, 当代中国的西藏边境政策与成效初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5 年第 3 期。

-
91. 杜作锋，信息时代边境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西部大开发刍议，《经济问题探索》，2001 年第 3 期。
 92. 于天福、隋丽丽、李富祥，中国边境口岸经济发展与依托城市互动机理研究，《社会科学报刊》，2015 年第 1 期。
 93. 梁婧姝、张燕生，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19 年第 7 期。